

应用人类学

——实践指南

[美] 埃维·钱伯斯 著

石 景 云 译

石 奕 龙 校

(二)

第四章、应用人类学的专业 (II)

“你怎么爱上应用人类学的？”曾有人问我。

“我是在无意中对它发生兴趣的。”我回答说。

在应用人类学的领域中，一位人类学家的特定兴趣往往更多地是由于偶然的事件而发展起来的，而不是有意去做的。例如，我的首次应用工作是帮助对一个联邦低收入住房援助计划的评估。当时我对政府的住房计划几乎什么都不懂得；最初雇佣我是因为我过去在田野工作中有些经验。他们看中我的主要是我的作为研究者的技能，而不是看中我的任何实际调查领域的知识。因此，继住房计划的研究而来的是，激发了我对在社区发展和都市计划中以及由此在应用的都市人类学的领域中的穷人住房问题的兴趣。这项工作也把我带进了新的应用研究的策略中，特别是那些评估研究之中。后来，也使我能够应用这些技能去从事其他政策范围的研究。

应用范围的专业常常包括好几种类知识的事

1、人类学领域的经验，特别是人类学的方法和步骤如何应用于已选择去做为特定注意的政策范围中的问题的经验。这类可利用的知识总数在一个政策范围到另一个政策范围中是惊人地变化着。例如，人类学家已在医药和保健、发展与教育的领域中做了大量值得重视的工作。但是，他们在像都市计划、社会服务、工业发展和劳工关系这样一些与政策问题有明显联系的领域内，则做得较少。

2. 应用范围的专业也要求有影响某一特殊的研究或实践领域的政策的经验——诸如立法、行政管理法规、习惯法和一个政策范围的历史发展等这样一些领域的研究或实践的经验。

3. 有效的应用工作几乎是必定要把人类学家带入基础的和应用的研究及实践的其他领域之中。应用人类学家可能热切期望的专业的每一领域已由其他人讲述过，而且往往是以非常不同的学科的角度和观点讲述的。掌握保健服务这类知识的能力不仅仅增强了人类学家的见识，而且也成为同自己的共同工作者交流意见的必要条件。

本章的主要部分在于介绍都市人类学和教育的专业。本章后面部分的一些地方将用于讨论应用研究的一些其他流行领域。

第一节 应用的都市人类学

除了极为特别的情况外，人类学以往没有保持长期地承担都市研究的义务。只是在过去的二十年间，人类学家有了更多的兴趣在城市中工作。这是因为能在乡民和部落背景中从事研究的人的数量大大缩减的缘故，从而使得突然增加的都市人类学的兴趣成了专门知识的一个项目。实际上，人类学只是在正常情况下于其间工作的人们中，简单地注视着那些离开穷乡僻壤使用各种方法进入城市的人们。在有些实例中，这是一个可以证明的事实。同时也帮助说明了都市人类学的主要兴趣在于都市化——即个体和群体从乡村到城市生活转移的过程。

然而，目前专业转移到都市问题所涉及的范围更加广得多了。

人类学家始终坚持“人的科学”不能为人类居留地的任何特殊形式所限制。大多数简洁的专业史表明，传统社会的研究所以被偏爱是因为这样的工作似乎是更加急需的，它为人类学家提供了惹人注目的文化方面和智力方面的经验，同时也帮助我们填补了我们在认识形形色色的人类生活方式的努力中的巨大空隙。

另一方面，都市人类学在人类学家关心人类的制度和习俗间的互相影响的方法中，以及在愿意把人类学的方法运用于从世界各地迅速地和往往是偶然地都市化而产生的种种政策问题中找到它的根基。在美国，应用的都市人类学的兴趣大体上同该国对都市问题的全面关心是相对应的。在都市背景中，辩护人类学的最早例子出现于十九世纪80年代期间，在其时，华盛顿妇女人类学社团已积极地卷入了为穷人的住房问题提出请愿的努力之中（卢里（Lurie），1966）。这些活动是同国家对都市贫困的关注以及对随进步年代改革运动的减弱的关注相一致的。应用的都市人类学新近的一连串发展则是同一国及全世界兴趣于把城市视为社会变迁的竞技场和社会变态的集中点的情况密切联系的。

都 市 化

人类学家很少从事指向都市化的直接问题的应用研究。

这是令人困惑的。而在他们的基础研究的爱好中，最热心的则是都市化中的问题。对前面章节中讨论过的农村重新安置政策，在都市中没有可与之相等的事物，尽管某些应用的都市课题和世界范围的都市化的长期影响一起，做过一些零星的尝试，诸如擅自占公地居留者的发展，以及同都市迅速地增加有关的医药和社会问题（巴沙姆（Basham）1978）。

这种介入的缺乏，也许是同都市化普遍地产生的方式，以及相对缺乏有关大规模人口迁移的明确的政府政策有些联系的。应用人类学家曾介入过的乡村重新安置计划一般是由于政府或私人的审慎干预的产物。从政策观念看，都市化更多是种偶然的事情。通常既不正式地认可（特别是关系到贫穷的和未受训练的移民都市社区尤如此），也不积极地加以阻挡。同多数乡村居地相比，城市倾向于是个“开放”的拓居区域。因而，政府企图限制人们向都市移居的情况是罕见的。在政府试过限制的地方，多半是极不成功的（格雷厄姆（Graham），1976）。

萨利·金布尔·梅基尔斯基（Sally Kimball Makieski，1978）曾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过这个问题，并指出了人类学家也许感兴趣和可以研究的许多题目，包括如都市化和郊区发展的社会影响。她还认为一种有效的都市人口政策需要政府（我要补充的是包括私人集团）的各种政策，诸如那些影响土地使用、都市更新、劳务和工业发展以及污染控制等政策的高度协调。

在少数例子里，人类学家曾有机会去参与或指导同大规模计划的都市化项目有联系的研究。廿世纪60年代初，莉萨·皮蒂（Lisa Peattie，1970b）同哈佛—麻省理工学院都市研究联合中心和委内瑞拉政府一道工作，她作为一个研究小组的成员帮助制订一座新城市的计划。圭亚那城（Ciudad Guayana）是一个偏僻的委内瑞拉小镇，它作为政府计划把它做为这个地区的工业中心的结果，突然变为一个主要的城市。这个计划的新城市的实际增长率是突出的——在1950年到1972年期间，圭亚那城的人口从4,000人增加到了142,000人（加查和布卢

伯格 (Garcia and Blumberg, 1978: 591)。

皮蒂对圭亚那城的计划设计的主要贡献是指导了一项对单一的工人阶级居住区域的生活的民族志研究。在这个方面，她没有偏离人类学的主流——她的主要目标是认识在社区这个层次上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由此为新城市的总体计划的设计提供适当的建议。

虽然皮蒂只能够在圭亚那城发展的早期阶段逗留在那里，但她的研究发现了计划设计过程中的许多潜在的缺陷。根据她“来自这个区域的观察”，认为这些缺陷的大多数是源于中产阶级计划设计者和居民中的较穷部分之间的交换思想问题。

皮蒂发现这些交换思想的困难是建立在三种现象之上的：这个区域的居民对新的都市权力结构缺乏亲切感，他们难以接近这种权力结构，和社会阶级的差别在工人和计划设计者之间有效的陈请上设置了压力（皮蒂，1970b: 85~90）。

在玛丽亚—皮拉·加查 (Maria — Pilar Garcia) 和雷·莱辛·布卢姆伯格 (Rae Lessing Blumberg) 对圭亚那城项目后来的评价中 (1978)，皮蒂研究中的许多评论看来几乎象预言似的。这些作者论证说计划设计者没有能力去理解或预测城市的较穷的公民的大多数不够正规的适应类型，这不仅仅使这些处于较不利地位的人们生活造成不必要的困难，实际上也破坏了该城的完整的总体计划。

一个如何发生这种情况的例子是发人深思的。总体计划是为整个新城市的平衡增长而设计的。工业发展主要放在很少移民居住的该城西区。这个就业的基础，同该城西区由政府资助的新住

房一道，意味着鼓励人口转移到西区，以减轻圭亚那城较老的东区的严重拥挤的威胁。令人遗憾的是，这种人口的移动从来不曾发生过。在计划设计者没有充分地预测的事情的基础上，加查和布卢姆伯格做了许多解释。

最重要的是，计划设计者希望阻挡类似那种对多数拉美国家的发展来说是很普遍的棚户区的发展（“棚户区”是临时凑合的擅自占据的聚落，由新近到达的移民建立的，通常是作为一个暂时的措施，计划设计者面临的问题是一旦建立了这样的棚户区，它们将会持续地存留下去，虽然它们也许为移民充当了一种能起作用的适应策略，然而，计划设计者倾向于把它们视为刺眼的东西和潜在的、可能产生纠纷的地方）。计划设计者在该城的西区阻止发展象棚户区这样的建筑，希望鼓励工人搬进政府资助的住房中。可是，新住房的建筑出现了耽搁，只建了极少的单元。同时，即使有津贴，这些住房对移民来说仍然太贵了。

住房问题所以加剧，是因为计划设计者忘记考虑典型的拉美都市化的型式。这种型式是先在某个城市立下脚跟的人，往往为他们的亲戚充当保证人。由于只有那些为工业所雇佣的人才资格居住在圭亚那城西区的政府住房中，因而许多预期为他们的亲戚作保证人的移民就决定居住在该城的东区。

移民的周期也对就业问题发生影响，这点也是计划设计者所没有预期到的。尽管工业的工作职位是位于城市的西区，然而，只有少数移民最终是在那儿工作的。大多数人则是做典型的拉美较低等的职业，如服务行业和不熟练的或半熟练的劳动方面找到他们的工作。这种工作的大多数在该城人口稠密的东区则较容易

找到。

由加查和布卢姆伯格所判明的这些及另一些其他因素的结果，所预测的人口会向圭亚那西区迁移的现象并没有发生。相反，在该城拥挤的东区，棚户区却扩展和兴旺起来。

在我们把这点作为另一个“就是如此”的故事来接受之前，我们要记住，那些宁可工作于预测中而不愿工作于回顾中的人类学家能够保全计划设计者的胜利，这是全然不确定的。我们依据利萨、皮蒂的研究早就可以看到失败的可能性的。那么，为什么她的警告和忠告会遭到勿视呢？我们无法简单地回答，然而，我们将有机会在第五章和第六章中重新考虑这个问题以及同样的实例。

都市计划制订与设计

计划和它们的设计是当代社会旨在调节变迁和承担改善的可能性的重要产物。计划和设计中所体现的设计者在制订计划时所有的技术知识和文化敏感性的任何水平，都会对计划施加压力。它们部分地反映了一个社会理想化的打算，在某种同等程度下。当一个复杂社会的不同的社会和政治的实体出现冲突时，它们包含着驱散和妥协意图的重要线索。现代社会的奋斗连同它的增长和保护，所有这些要素均可从正式计划的文本中以及复杂的说明中找到解释。

设计师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 (Christopher Alexander, 1965) 还相信计划和设计反映着人类意愿的结构。他认为唯一的问题是：人们设制抽象计划的方法往往与他

们实际地设制自己的生活的方法不同。在每一种想法（计划的一部分）明显地同其他的想法相分离的地方，在诸种想法之间的互相联系是简单的地方，即便计划是不精密的，图解式的以及默契的，计划也是把复杂的观念塞进松散的、有秩序的形式中的简便的方法。亚历山大说，多数的计划设计采用了众所熟悉的家族世系图表的表现形式。世系图表的好处之一是它能一目了然；它使我们有顺序的感觉。但是，它怎么能真正地做到反映现实呢？最初在编写有关城市计划时，亚历山大就指出，最好将人们如何在城市中实际生活的现实图解更象一个“不完全的网络”，而不要象一个世系图。在一个不完全的网络中，各种功能重迭在一起。一个如同城市一样的正规而理想的结构的功能，就和以类似世系图状的组织表所勾勒的政治体系或以城市土地使用计划所描述的空间关系一样，实际上点缀着一个精制的、不拘形式的网络和总在变化的格式，通过这个网络和格式，个人和群体着手于他们的事务。这些新近的格式不总是同由世系图状的构思来代表的刻板观念和部分意象的结构相一致的。

这种威胁的大多数在于假设了循着世系图所勾划的城市观念的线索而产生的结构和经济思想实际上是代表着城市所从事的某种方式。亚历山大强烈地反对这样的引诱：

“对于人类的愿望来说，世系图是把复杂的思想最简单化的方法。然而，城市不是，也不可能是，而且必定不是一种世系图。城市是个生活的容器。假如这个容器服务于在它里面一串串交迭的生活的话，由于它是一个树状系统，它就象一只装满竖着的刀锋的碗，随时准备把任何投进去的东西撕割开。在这样一个容器中，生活将被切成碎片。如果我们把城市设制得象世系图那样，它们将在其中把我们的生活切成碎片（1978: 402）。

韦斯利·内卡吉马（Wesley Nakajima, 1979）是一位计划者和人类学家，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类似世系图的思想如何能影响一位计划者的都市现实观念的例子。计划者经常满足于用分立的和正式界定的单位：诸如人口普查期间来研究都市问题。不幸的是，这种单位不总是同社会现实一致，或者说不总是同明确表示他们街区的特定区域的居民生活方式一致。内卡吉马在美国东南地区的一个城市的制定计划的组织中工作时，曾寻求改进该组在一个人口普查期间去计划发展的能力。他要求这个地区的居民自己画出他们所理解的街区范围图，同时，在人口普查期间进行了民族志的调查和访问关键的提供信息者。

作为这样工作的一个结果，内卡吉马在一个人口普查期间验证了四个不同的街区，识别出每一街区的独特特征、生活样式和需要，帮助计划者对每一街区的需要做出反应，并劝阻他们不要根据由整个人口普查期间的单纯的人口统计的轮廓所获得的感觉来计划这些街区的需要。

在指出“以人口普查期间来计划”的危险时，内卡吉马描述了一个制订计划的组织寻求在一个废弃学校中安置娱乐中心的例

子。如果该计划的设计者较早地认识到这所学校是坐落在退休人员居住的街区中，而这些退休人员又是几乎必然要反对任何将吸收儿童和改变他们街区特征的计划；那么，附近居民会反对这种计划应该是能够估计到的。计划者从广泛的人口普查期间认识到需要娱乐设施，但是，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当地街区界限的重要性，因而，在使用对该普查期间的认识时就导致了不合适的决定。

计划者和他们的计划将涉及到的人们间的社会阶级和文化差异往往会导致误解。由于计划的制订几乎总是要求对有关的有限资源运用于特定的各种问题作出决策，冲突的潜在可能永远是存在的。迈克尔·帕迪(Michael Pardee, 1981)提供了一个例子，即佛罗里达州坦帕市一群旨在帮助的计划者和建筑师同当地街区中低收入居民发生的冲突。计划者曾为一项该街区的“恢复计划”进行工作，他们的背景主要是在于历史建筑物的保护，同时，他们对社区恢复而提出的建议明显带有他们自己的美学和文化价值观。另一方面，在衰败中的街区的许多居民关心的则是这个地区的经济活动。他们对保护的最后目标的直接反映是消极的；他们宁肯看到旧的建筑物倒塌，而以新建立起的新商店和商业设施来代替它。

应该指出的是，一个区域中的经济发展和历史性建筑物保护的最后目标之间的冲突并不必然地存在。帕迪指出的问题基本上是个沟通的问题。计划者由于没有^能力或者不愿意把他们的政策重点的意义同该街区的居民协商，因而，他们的恢复计划的重要性因此而减弱了。

帕迪的例子强调了计划制定的社会文化方面。在他作为一位应用人类学家和与他共事的建筑师之间存在的冲突之一，是集中于建筑师的倾向是把社区恢复首先视为街区的有形设计的问题；而帕迪则把有形设计视为许多方面中的一个方面。同许多其他的发展活动一样，由于常常从单一方面的方式来提出某一计划活动

这个事实——不论它是由任何一种特定的职业的观念来提出的，诸如我们在这里所看到是从建筑学的观点提出的，或者根据政府部门或其他机构所给的限制来提出的，从而使都市计划的制定变得复杂化了。例如，联邦政府社区开发基金如何花用的限制经常是在建立于政府的联邦层次这一级所认为迫切需要的基础上的。这样，在地方或区域这一层次上建立也许能更好地说明地方的社区需要的重点就成了困难。然而，这种需要的重点也不一定会与联邦所确定的重点发生冲突。

由于应用人类学家倾向以整体的观念去研究一个问题，因而，他们往往由于这种基金提供的限制而遭到挫折。感觉到他们的生活是个整体而不是局部的社区也往往遭到挫折。另一方面，清楚地确立提供基金政策的存在通常也有着有力的理由；它们把资源集中用于一个特定的问题上，较之把稀薄少量而又有限的基金分散在各处要强得多；它们增加了对资源使用的会计责任，并有助于保证基金不随便花用；还有，它们能够有助于促进长期规划的努力。

制订辩护计划是在社区层次上重新商议政策重点的一种方法（尽管它的确不是唯一的方法）。利萨·皮蒂（1968；1970a）指出，都市的穷人和少数民族时常为计划制订的过程所忽略，指向试图去理解穷人社区的需要和偏好的应用研究，有助于补偿^{这种}忽略的行为，但是，这或许是不够的。皮蒂把计划制订的过程看成为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各种各样的“演员”试图去达成协议。这样的舞台也许是由有关人的知识而赋予活力的，但是，“戏剧”的最重要意义的要素是参与。皮蒂论证

说，辩护不能限于为有关那些被计划制订过程所忽视的人们提供信息；它要求鼓励这些人来成为演员。

在某种程度上，美国新近的公共政策已鼓励上演这样的戏剧了。联邦和地方法规要求为“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提供这样的舞台。辩护者和社区组织提供这些演员经常是和公共与私人机构两者的财政支持和鼓励联系的。这样的努力已使得专业的计划者、商业性的开发者和地方选举出的官员更多地认识到和关心他们的行为所能引起的人力所及范围的和街区这一层次上的后果。另一方面，有组织的街区和社区团体似乎不用全面地对计划的有效性或者甚至是对公正的计划制订作出答案。德尔莫斯·琼斯(Delmo Jones, 1979)就论证说，在一个城市中，这样的团体往往作为极保守的力量而起作用，组织起来服务于他们特殊的利益，有时则对更广泛的社会问题不同情，或者进行对抗。随着社区组织对纠正计划制订过程中的不公正现象有愈来愈多的潜在影响力，它也许也促进了其他的社会不公正，这就同当一个社区组织起来反对它的街区的种族成为整体时可能有的情况那样。这样的反对并不限于中等阶级的社区。在具体的实例中，它也许更猛烈地存在于那些民族成分均一的低收入街区之中。

应用人类学家参与过同社区发展有关的各种项目。某些就象皮蒂那样的人已把低收入街区视为他们的重要研究对象。另外，一些象内卡吉马那样的人则为城市计划机构工作。某些人已在州和联邦公共机构中获得了工作，而另外一些人则在私营机构中工作。总有一天，会有一个公共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同街区联系一道工作的人类学家起来反对为那些打算在街区中建筑高层公寓

的开发者工作的人类学家。也许，城市的计划者也会是位人类学家。到那时，我们将比从任何大量的“就是如此”的故事中学到更多的专业知识。

应用人类学家也曾直接同建筑师和设计者一起共事，努力去保证该设计对它的使用者的环境、社会和文化偏好有较好的反应。阿莫斯·拉波波特（Amos Rapoport），一位建筑学和人类学的教授，可作为人类学和建筑学的知识和意图之间互相影响的理想的一个缩影。在他的著作《都市构成的人类方面》

（1977）中他认为要在社会科学家和都市设计者之间交换思想获得有效的水平存在着困难，那就是两种专业的从业者们有关对方领域的知识懂得很少。拉波波特提倡的“人—环境”方法的都市设计，要求其具备有人们如何对各种城市的理解和反应的知识，以及对各种城市是如何建立起来的理解（1977：383）

并不是总能够从某一单个人如从拉波波特那里获得这样全面的知识。相互配合协作是对不寻常的设计问题作出许多有力反应的基本成分。乔·哈丁（Joe Harding）同一群人类学家一起工作过。这些人类学家正在帮助一群设计那伐荷（Navajo）社区学校的建筑师。人类学家从事两个阶段的工作。第一，他们从事一项调查和需要评估，以决定那伐荷人如何使用他们现存的学校设施，和他们想要在新的结构中结合进什么特征和用途。然后，人类学家同那伐荷人一起工作，在已判别出来的需要中去决定重点。这项研究判别出了几种需要和重点，它们可以通过恰当的设计而付诸现实：

“…对新的中心来说，传统建筑学的某些方面是需要的，

而其他方面则不一定。一般的泥盖木屋(hogan)形状是适宜的,然而,传统的材料就不适合了。例如,传统的泥盖木屋看来象是有着粗糙的内部。对于他们的学校/社区中心,那伐荷人要求柔和的、平滑的结构和外表加上最先进的设备。对各和窗户的偏好是十分复杂的。一般而言,人们希望在房屋上有窗户,同泥盖木屋不设窗户的风格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伐荷人想享受看外边的乐趣,但又不愿让人家从屋外窥探里面。是否存在使人有任何相似于美国西南部印第安人村落特征的感觉也是重要的。由于某些意见仍存在于那伐荷人和美国西南部印第安人村落的居民之间,因而,为那伐荷人建筑住房时,掺合进任何也许能把它视为类似美国西南部印第安人村落风格特征的东西,就会出现一个大错误(1979:23)。

哈丁注意到了合作在两方面是成功的。即建筑师在他们为学校的设计中利用了人类学家的建议,而那伐荷人则不加任何实质性的更改而接受了这项设计。

都市的穷人

贫穷的消除和我们把它同贫穷相联系起来的症状的消除已成为大多数现代政府的主要政府目标之一。与贫穷有关的指数,诸如失业统计数字、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百分率、人均收入和住房标准的测定等,往往被选择来作为一个民族的社会和经济健康的重要指标。尽管贫穷并不限于都市的经历,然而,它在城市中确实比其他地方更为明显些,因而,它是政府政策的一个首要的目标。历史学家萨姆·沃纳(Sam Warner,1973)认为

美国反贫穷计划的增长是同现代交通运输的改善和郊区生活的发展相联系的。当都市的中等阶级为了“干净的郊区”而开始放弃他们市内的街区时，他们从工作地点到家中每天的往来，使他们通过城市的贫穷区。这些每天见到贫穷的提醒促发了较多的关心去改善穷人的生活条件。

都市人类学使它自己如此容易地引向应用兴趣的一个原因是：当都市人类学开始表现出对都市这个场所不断增加兴趣时，大多数人类学家选择在都市的贫困地区中工作。关于这一点有着许多原因。我们已注意到许多人类学家似乎感到在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上勉强能收支平衡的人们中间工作是最惬意的。贫穷往往是同种族丰富和文化上具有独特的生活方式有联系的。这类事情是人类学家所惯于处理的，反之，中等阶级的都市生活则往往（和相当不适当地）同“单调”和相似联系在一起。穷人往往要比有个人隐私权意识的中等阶级更容易接近。此外，对贫穷的条件和原因不断增加的关心，已促使了在过去数十年间政府对这个领域研究的支持的稳步增加，虽则略有些时多时少的型式。

人类学和贫穷问题的任何讨论都必须包括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和他的贫穷文化的概念。刘易斯根据他在印度农村、墨西哥乡村和都市以及波多黎各与美国的都市中的研究导出了这样的概念。他写得出色的和反映生活于贫困中的人们生活史——如《五个家庭》、《桑切斯的儿童》和《生活》——在人类学之外也拥有广泛的读者。另一方面，刘易斯（1968）从这些经历中导出一般性结论的企图和对贫穷文化的描绘也激起了相当多的批评。

刘易斯认为贫穷文化对世界上大多数的穷人的生活有着普遍的影响。他声称说，实质上，贫穷的条件不论它发生于何处，常常促使人们采取一系列心理特征和社会—环境的反应，这些反应变得痛苦难忍地困难去改变的。刘易斯提供的一系列特质中所包括的有：屈从和宿命论的感觉、缺乏计划未来的动力、低于别人的感觉和缺乏有效的政治组织。刘易斯认为这些特质是文化上的凝结，它是通过在贫穷状况下生活了一代又一代而学来的，从而是不容易治疗和改变的。

刘易斯的批评家（人数不少）论辩说，他的概念冲淡了同贫穷有关的结构条件的重要性——它把贫穷的责任推卸到穷人的身上（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的思想贫乏），以及不合适地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应对由拒绝给予一个社会的大部分人以机会的中等阶级的社会和经济机构对而造成和保持的贫穷应负的社会责任。瓦伦丁（Valentine, 1968）认为贫穷文化的概念也限制了我们在人们对贫穷的反应中考虑民族差异的重要性的能力。

这种争论对文化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有着严肃的政策含义（当把文化只是视为人们生活中的一种持久的、稳定的、难以改变的力量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当埃德温·埃姆斯和朱迪思·古德（Edwin Eames and Judith Goode, 1977: 319-320）应用刘易斯的观点时曾指出两个这样的含义。第一，贫穷文化的概念鼓励决策者去偏袒“旨在改变穷人的行为和价值观”的计划，而不是偏袒那些将改变更主要地是歧视穷人的社会和经济制度的计划。第二，使人误入歧途的反贫穷计划的失败可以很容易地归咎于贫穷当事人的态度，而不是归咎于该计划制订的本